

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傅宝良

李志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周口村供销社工作，与傅宝良，门对门，同饮他作的关系，与傅宝良相处的感情。我由衷地敬佩他，更钦佩他舍小家，顾集体，发展农业生产，走社会主

帮助乡亲多打粮



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我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家的一井水。同时因工得非常和谐，有着浓厚对供销社工作的支持，带领群众，艰苦创业，义道路的精神。



傅宝良同志被选为北京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北京市农业劳动

1948年10月，周口村解放了。不久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的农

民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但也有极少数人，因受了反动派的恶意宣传，害怕地主反攻倒算，把刚分的土地卖掉。也有的人不敢加大投入，精耕细作，当时平均亩产玉米仅有百余斤。这些现象，被傅宝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反复思考：“好不容易盼到翻身解放，没有土地的人家分了土地，如不重视，有的人家还可能受穷，亦会影响农村新生政权的稳定。”于是他主动找村党支部书记卢翠英商讨，加强对分地农民的

图2：傅宝良同志荣获河北省和北京市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部分奖章，上排左1、2为1950年—1951年荣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右1为1956年荣获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下排左1、右1为1954年—1956年荣获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颁发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章。下中为荣获房山县生产劳动模范奖章。中排两枚为1956年—1957年纪念章。

引导，加大投入，发挥地力，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傅宝良走东家串西家，讲述自己多年种地的经验和体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人哄地，地哄人，马虎种地白劳神”“积肥有千条，看你找不找”……。经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宣传，提高了群众认识，鼓舞和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增加投入，广积肥、多施肥。1950年组织农民建猪圈72个，养猪50头，牛马驴骡50多头。对大牲畜棚圈，勤垫土，常起圈，积肥90多万斤，打蒿草沤绿肥20多万斤。平均每亩地施肥4000斤。同时，他还研制发明了“三合剂”农药，即五加皮1斤、莞蒿10斤，石灰5斤，兑水30斤的比

例为一剂。使用时加水 300 斤，一剂可喷洒 50 亩地庄稼。效果好，花钱不多，很受群众欢迎。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好地作用。当年每亩地平均增产了玉米 76 市斤，全村共增产了粮食 50724 斤，进一步鼓舞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1951 年，傅宝良同志被评为农业技术劳模，出席了河北省第一届劳模大会。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表彰。

组织互助合作社

1951 年 2 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确定：“继续贯彻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的决定”，这给予傅宝良指明了方向。他又不失时机地以“自愿、互利”的原则，首先组织起有张凤兰、傅义、李淑文、张文志、傅宝良、高淑琴、马淑琴七户农民参加的，周口村第一个互助组。互助组有 35 口人，80 亩土地，因他种地有经验，耕、耩、锄、刨、提耩、下种，扬场、拔簸箕样样精通，大家选举他为互助组组长。互助组成立后，由于采取互助互利，有活一起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难互相帮，合理出工，合理记工，多劳多得，收益归个户，年终兑现找齐等分配办法，初步显示出了互助合作组的好处，粮食连年增产，收益增加。

1954 年 1 月，中央关于“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傅宝良在原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大力宣传，深入发动，大讲成立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社会主义是金桥，单干是独木桥”；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以后人们居住的条件会越来越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国家集体富强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经他入情在理的深入宣传讲解，社员纷纷要求入社，跟他一起干。1954 年春组建起周口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胜利社），亦是周口店地区建立较早的合作社之一。为了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社，傅宝良舍小家，顾大家，带头腾出两间房屋作为合作社的办公室。把自家三头耕牛、两头大母猪和一辆铁轮车，及院子的棚子全部无偿捐给了合作社，他的善举，受到了群众的赞佩。

人民代表为人民

1954 年 6 月 20 日，市委副书记、市选举委员会主任刘仁为他颁发了代表证书（证号 531 号）。在北京市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期间，于 8 月 22 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傅宝良见心潮澎湃，辄想起旧社会，的泥腿子，哪派只会欺压百抓民夫、修炮而新社会，在下，农民真正家领导人照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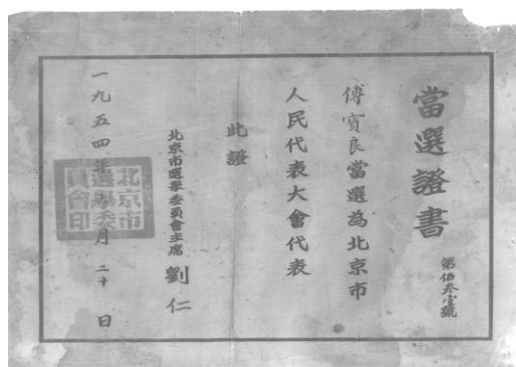


图 3：1954 年 6 月 20 日市选举委员会刘

讨国家大事。他反问自己，该如何去做呢？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两句话：“今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好好工作，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全村百姓，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人民代表要里开代表会前，见和建议，写好他和刘桐恩代表西矿区几个农业



图 4：傅宝良代表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济》的 7 号提案，重视，很快对京西矿区斋堂、清水、金鸡台三个乡，无依无靠、生活困难的孤老社员，生活不能维持的，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当年第四季度，发给这三个乡生活困难户补助和修房救济费共 12660 元，还发出了棉被 15 床和棉衣 40 套。此外，这些乡 1956 年冬还开展副业生产，并输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去做壮工，使困难户都增加了收入。1956 年，他又与刘代表共同提出《改进兽医工作，防治牲畜疾病》的 101 号提案，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市政府有关部门从 1956 年 6 月份起在各区都建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专门负责各区的畜牧兽医工作，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站的业务领导。同时，农林水利局抓紧编印家畜疫病预防治疗的先进经验和先进饲养管理办法，在全市推广。这对郊区畜牧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久，他领导的胜利合作社与本村东风社合并，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他一直担任合作社社长和大队长职务。工作中积极响应党大办农业生产的号召，坚持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多种经营，注重改善群众生活。为了动员多养猪。他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在养猪上，他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猪要管好，圈干吃饱，强弱分养，热天洗澡，注重卫生，圈勤垫扫，新生小猪，要防压着，繁育仔猪，公母选好。”他对养猪很是精心内行，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不是外出开会，他都要抽空儿到猪场转一圈，哪头猪快要下猪了，哪头猪快要出栏了，他心里都一清二楚。有一年的寒冬晚上，天特别冷，有头母猪要下猪了，他和饲养员一直守护在母猪旁，母猪每生下一

到毛主席后，当晚，他转反侧，彻夜难眠。回我这个与土坷垃打交道有当代表的份呀！反动姓，搜刮民财、要捐税、楼，当牛马，受欺压；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当家作主人了！能跟国和市政府领导人一起商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哇！

反映民意，他每次去市都要多方征询群众的意提案带到会上。1955 年，共同提出《请政府对京合作社的困难户予以救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头小猪，他就用身穿的大襟棉袄裹好抱回家里放在热炕头上，用棉絮围好，小猪要吃东西，他就让老伴用奶瓶给小猪喂米汤，直到小猪硬朗后才抱回猪场交给饲养员。他的行动感动着每个饲养员，他们的养猪场，猪养的好，出栏快，收益高，仅 1959 年养猪年存栏 5000 多头，国庆 10 周年前夕，一次向国家交售生猪 500 余头，全年向国家交售生猪 2000 多头，有力地支援了国家，为偿还外国债务和保障首都节日市场的供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以食为天，为了使农业稳产高产，他带领群众采取“精耕细做”、“合理密植并打井修渠，改造低产田等措施，削平乱石土岗 50 多座，挖岗填洼土方 50 多万立方米。打井 11 眼（其中机井 2 眼，）修水渠 4000 多米，改造村西河滩低产田 200 亩，使粮食亩产逐年提高，到 1960 年亩产上了纲要达到 400 斤。为了增加集体收入，从 1956 年开始，他带领社员在京周公路北建起了 300 亩果园。组建起一支 25 人的专业队，投资 5000 多元，购进新品大桃、苹果、杏、梨和葡萄等树苗。为抢栽果树，组成了 50 人参加的青年突击队，全村青年，人人报名参加，不提报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挖沟填土，平地培埂，刨坑放苗，浇水施肥，昼夜不停，奋战在果园，直到把果树栽完，无人喊苦叫累，都怕落后寒碜。果园每到春季鲜花盛开的时节，苹果花、梨花等也次第开放，令不少去周口店龙骨山的中外游客停车驻足，观花赏景，拍照留影。经过精心培育，改良土壤，适时浇水施肥，防止病虫害等科学管理，果树长势良好，几年功夫，结出丰硕果实。1962 年，通过不断实践，改良，培育出“三熟”葡萄。（早茬、中茬、晚茬），他们的经验还吸引了十里八村的果园管理人员前来参观学习，对全公社及至全县葡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果品收获后，傅宝良和他的乡亲们，坚持“统筹兼顾”的精神，遇事想全局，全国一盘棋。首先把果品卖给供销社，供应首都市场，让城里的工人老大哥和市民们尝尝鲜。待完成向国家交售果品任务后，剩下的再给社员分。1960 年，果品产量达到 15 万斤，既供应了市民需求，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美化了环境。由于果园管理到位，交售任务年年增加，产量年年提高，收益年年增长。果园队长傅让，还被评为北京市果园技术管理模范，并出席北京市劳模大会，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表彰。为了让更多妇女参加劳动，跳出“三台”（锅台、碾台、磨台），他选派有经验，责任心强的傅秀英为幼儿园园长。没有场地，就因陋就简利用村西大庙进行改造，使村内大部分婴幼儿能入园。幼儿吃饭、学习、就医等一应俱全，使 90% 以上的婴幼儿母亲能安心生产劳动。他们的幼儿园，曾被京西矿区妇联评为先进典型，园长傅秀英自 1957 年到 1965 年一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保育员，连续多年出席北京市劳模大会，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改善群众生活

他常说：“农业生产也和打仗一样，不能光叫群众干，还必须关心群众吃喝暖，群众才有干劲，有奔头。”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带领社员自力更生，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社员一些生活问题。首先解决烧煤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勘测，在黑山嘴附近的河滩开挖小煤窑，供群众生活用煤，并抽出5名社员，15头毛驴为社员送煤、运土，使群众安心搞生产。其次用自产的白薯和黄豆做粉条、团粉、豆腐。缺少技术人员，他们从长沟请来师傅，组织起7人的食品加工厂，解决群众一些食品供应问题，博得群众好评。

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办食堂”等活动。期间，他任周口村大队长。他说：“我是人民代表，一手托两家，上对党和政府负责；下对百姓负责，要坚持空话、假话。否则，会他自打互助组开始，一每天天不亮起床第一件把转的情况告诉队干部说：“当干部，不能当‘空心中有数，不误庄稼，”



图5：傅宝良劳模应邀出席国庆节

权利要为民所用

傅宝良，在任职期间，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处处精打细算，十分注意节约集体的每一分钱。他不占集体和社员的一点便宜，外出开会、办事，除市内外，一般都自带干粮，骑自己的自行车。1956年京周公路开通后，公共汽车穿村而过来回跑，有人不解地跟他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为什么还老骑自行车？”他却说：“坐公共汽车还得掏钱，现在咱家底还薄，用钱地方多，能省一分是一分。”他生活很俭朴，身上有“四件宝”烟袋锅、烟荷包、羊肚手巾、大襟袄。这一生活习惯，一直到他去世，从没变过。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子女。他当代表、干部、劳模10多年，经手招工、招干数十次，他都让社员子女进城了。而有时其他干部提出让他的子女去，却都被他一次次谢绝了。有时他的孩子也想不通，他耐心作孩子的工作。他对儿子说：“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只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不能因为我是代表、是干部就让你去当工人，与社员争好处的事儿我不能做。否则，人家会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说话就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我虽说不是党员，但我要听党的话，当人民的公仆。”孩子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安心扎根黄土地，在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

踏遍青山人未老

1960年，傅宝良已过花甲之年，他主动把大队长的职务让给了青年干部魏世忠。但他不是船到码头车靠站，从此安度晚年，而是开辟了新的绿荫战场。他感慨地对新上来的干部们说：“我们住在周口店龙骨山脚下，周口店‘北京人’是中华民族祖先曾经居住栖息的风水宝地，我们有幸享受着山的灵秀之气，坝河水的滋养，这是我们的福气。古人从前吃绿、穿绿、住绿、生活在这片绿色家园里。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孙，多年来，人们开山挖石烧灰，满山伤疤。冬春季节，风沙弥漫，虽说我们建起了果园，有了片绿色，但这远远不够。我想在有生之年，把西大沟多种些树木，由黄变绿，建起村西风沙屏障，装点锦绣，把土地绘成丹青。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代表活力、代表希望。在咱村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雨季可防洪灾，冬春可以防风沙。使中外游人，到龙骨山去旅游，路过我村清翠秀。树长大成材，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座绿色银行，等我见上帝的时候，我上不愧待祖宗，下不愧待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带着10几名社员，赶着一辆牛车，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坚守在造林现场。他首先在村西大沟拉开了战场，摆开了阵势。投资5000元，购置了杨树、柳树、洋槐树等树苗。引用上游周口店坝河的水把长达1500米，宽20米的烂河滩全植上了树，使昔日荒草河滩污水沟，变成了一道绿色靓丽的景观。傅宝良曾经被评为农业技术劳模、模范社干部和劳动模范，并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多次表彰。从1954年开始连续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多年劳累，积劳成疾，于1976年1月13日因病逝世，享年75岁。

李志国：原宁夏宁光电厂经营支部书记